

# 费希特的锁闭商业国思想与现代性批判<sup>①</sup>

张东辉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锁闭的商业国》是费希特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是其法权思想在现实国家中的具体运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简要介绍锁闭商业国的基本特征,着重阐明费希特政治经济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所构思的一个虚幻的乌托邦本身,而在于它的深刻批判意义。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将费希特锁闭商业国的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对自由贸易、人性、生存与自由之悖论的反思,这对我们今天批判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和思考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自由贸易;人性;生存;自由

**中图分类号:** B5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8)01-0117-06

费希特的《锁闭的商业国》(1800年)系《自然法权基础》(1796/97年)的续篇,是其法权思想在现实国家中的具体运用,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锁闭的商业国》自出版以来的两百余年间并没有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费希特锁闭商业国思想的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遮蔽的,本文在此不揣冒昧,尝试挖掘费希特潜藏在锁闭商业国思想背后的现实批判意义,并将他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作一简要比较。

## 一 锁闭商业国的基本特征

费希特的《锁闭的商业国》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锁闭商业国模式,概括地讲,这样的锁闭国家具有三点基本特征<sup>①</sup>。

### (一) 三个阶层的划分

基于基本生存条件的考虑,费希特在国家中划分出三个主要阶层:生产者阶层、手工业者阶层和商人阶层。生产者负责采集和种植自然产物和自然作物,手工业者有义务将生产者提供的产品制作成成品用以消费,商人则在生产者与手工业者之间从事买卖交易。这三个阶层通过彼此缔结的契约,将各自的义务和职能明确下来,并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督和调控。费希特国家学说的核心原

则在于使人们能够生存下来,并尽可能地生活适意,而这三个阶层在他看来已经能够基本满足这个宗旨。当然,费希特也承认,除此之外还应附属性地存在公务员阶层、教师阶层和军人阶层等。

### (二) 计划经济模式

费希特的锁闭商业国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来运行的,政府在整个国家的日常运转中发挥着调度和指令的核心作用。政府在经济领域针对这三个阶层执行的职能主要包括:

(1) 政府要准确登记和掌握各个阶层从业人员的数量,并定期组织考核他们的专业技能,以确保他们的业务能力和各个环节的生产能力;

(2) 政府必须确保每个公民都能靠劳动生存下来,并尽可能地生活适意。国家有义务杜绝穷人和懒汉,而要确保这一点,国家甚至有权对公民的私人领域实施干预;

(3) 调控市场,稳定物价。政府严格监督并确切掌握各个阶层的生产加工能力和流通商品的市场信息,使本国货币的发行量与商品的数量或价值始终保持在适当的比例,这样就能准确控制物价,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 (三) 自由贸易的禁止

费希特锁闭商业国模式的最独特之处乃是:

<sup>①</sup> 收稿日期:2017-09-26

基金项目:201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2017BZX008)

作者简介:张东辉(1976-),男,湖北宜昌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sup>①</sup>《费希特文集(第4卷)》,梁志学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60页。

禁止国际货币,发行本国货币,关闭对外贸易,严控国内贸易。他主张,国家在获得自给自足的自然条件即天然疆界以后,就要禁止对外贸易,将自身完全锁闭起来。国家公民与任何外国公民的直接交往都应当被取消,只应在自己所属的阶层尽好自己的本分。但费希特认为学者和技师仍可以出国旅行和交流,他也不拒绝人文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遍传播。

## 二 批判自由贸易

费希特主张,商业贸易导致欺诈、贫困、不公和战争,甚至贸易本身就是一场以买卖双方争斗的形式发生的战争。他说:“在商业界,以买卖双方争斗的形式发生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的战争。世界上居住的人愈多,商业国通过兜揽生意而囊括的范围愈广,生产和工艺愈发达,因而投入流通的商品的数量和一切人的需求愈增长和愈多样化,这种战争就愈激烈,愈不正义,就其后果而言也愈危险。”<sup>①</sup>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易就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一样,想方设法使交易有利于自己一方。因此,在费希特看来,贸易从来都是不平等的贸易。他指出,各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普遍准则是:“货币应当留在国内;外国人的货币必须吸引到国内来。”<sup>②</sup>为此,各国必定会不择手段地成为强者,因而恃强凌弱、损人利己已成为国际贸易关系的常态,而持续升温的贸易战往往导致战争,“争夺贸易利益往往成为爆发战争的真正原因,尽管人们给予战争以别的借口”<sup>③</sup>。与亚当·斯密的见解全然相反,他认为国际贸易还会导致一个必然的恶果,即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从而致使一些穷国沦为富国的附庸,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费希特主张彻底关闭对外贸易,连国内贸易也必须在政府的干预和主导下进行,以杜绝欺压诓骗、囤积居奇和投机取巧的现象。实际上,当费希特对于国内贸易提出货币与商品价值之比例的固定化,因而国家拥有商品定价权的时候,已然在本质上取缔了自

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商人阶层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只是在生产者阶层与手工业者阶层之间从事产品交换的单纯中介,因为既然供给与需求在锁闭的商业国里完全是由政府掌控和主导的,连产品价格和各个阶层的利润也是由政府确定下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和贸易就已不复存在,所谓的商人不过是徒有其名。

像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一样,费希特的《锁闭的商业国》也是以世界的“永久和平”为终极目的的<sup>④</sup>,但他们通向这一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截然不同。康德对自由贸易持乐观主义态度,认为“商业精神”是一种“相互的自利”,大自然正是借助这种商业精神,才将各个民族结合在一起,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世界和平的出现<sup>⑤</sup>。康德的乐观主义还表现在,他认为“竞相猜忌的虚荣心”和“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总之“非社会的社会性”,是人类优秀的自然秉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手段<sup>⑥</sup>。针对类似的观点,费希特从批判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给予了反驳:“有人向我们大力颂扬业已开展的世界贸易体系通过旅行和交往给各个民族的相互了解带来的好处,颂扬由此产生的多方面的文化。……但我觉得,我们虽然致力于造福人间和到处为家,现在却一事无成,到处难以为家。”<sup>⑦</sup>在他看来,“自由贸易”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和公正的,所谓的“自由”不过是强势的群体和国家开拓市场牟取暴利的幌子和通行证,“他们的自由是贸易和赚钱的自由,不要监督与公安的自由,不要任何秩序与道德的自由”<sup>⑧</sup>。因此之故,费希特主张,要想真正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恰恰不是靠推广商业精神,而是靠每个国家都锁闭起来互不来往。

如果说费希特的贸易导致贫困的主张与康德的互利互惠的商业精神是针锋相对的,那么,它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则有诸多契合之处。如上所述,费希特认为,自由贸易不可避免地带来一部分人与国家的富裕和另一部分人与国家的贫困,只有通过取缔对内和对外的自由贸易,实行计划

①《费希特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0页。

②《费希特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7页。

③《费希特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0页。

④《费希特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1页。

⑤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1页。

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8页。

⑦《费希特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0页。

⑧《费希特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9页。

经济政策,才能有效消除贫困。继费希特之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理论中更加深入地剖析了贫困问题。他像费希特一样主张:(1)市民社会必然导致贫困;(2)贫困只有通过国家的调控才能得到缓解。黑格尔从思辨的角度分析,在市民社会这个需要的体系中,原子式的个体竞相逐利,满足自我需要,“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sup>①</sup>,势必造成这种个体的特殊性或主观自由没有节制,没有尺度。结果就是,“人通过表象和反思而扩张他的情欲,并把情欲导入恶的无限。但是,另一方面,匮乏和贫困也是没有尺度的”<sup>②</sup>。同时,黑格尔还从现实的角度分析,借助市民社会中市场的逐步扩大和科学技术的日益普及,财富的积累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sup>③</sup>。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黑格尔指出:“(两级分化)这种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和。”<sup>④</sup>如果我们将费希特所说的自由贸易体系纳入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框架内,就会发现黑格尔似乎会更倾向于赞同费希特的见解。

费希特洞见到自由贸易的欺骗性,认为自由贸易从来都不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不过是逐利的自由和强者的自由,由贪婪卑劣的人性主导的所谓自由贸易必然导致欺诈、贫困、不公和战争。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看,费希特的这种批判思想已经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立场。马克思早期在评价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时,像费希特谈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一样,也强调:“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sup>⑤</sup>但是,如果说费希特主要仍停留在基于一种传统的、抽象的人性观来看待自由贸易的消极影响,那么,马克思则更加深刻地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把握到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本质,即资本的逻辑,或者说,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马克思深入追问:“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

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存在。”<sup>⑥</sup>此外,虽然费希特与马克思对自由贸易持相同的批判立场,但他们应对自由贸易的方法却是截然不同的。费希特消极地主张闭关锁国,取缔自由贸易,以期实现世界的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永久和平,而马克思积极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sup>⑦</sup>,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不言而喻,费希特的主张更倾向于一种乌托邦理想,难以实现。

由此观之,我们可以将费希特当之无愧地归入最早批判资本主义商业文明,进而批判现代性的西方哲学家行列,黑格尔、马克思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都与他的现代性批判意识具有极其密切的承继关系。费希特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和现代性的严重缺陷的清醒认识,犹如卢梭之于启蒙理性,意义非凡。时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纷纷涌现出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它们喊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在学术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辩证时空乌托邦理想”的替代方案,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则明确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公正的全球化,呼吁全球化的人道主义,等等。而费希特锁闭商业国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恰恰体现在,他早在两百多年前,在全球化肇始之时,就已像今天的思想家一样洞察到全球化的潜在危机,并以闭关锁国的替代方案加以应对,尽管方案本身未必妥当。

### 三 反思人性

总的来说,费希特在晚期对人性持悲观主义态度。他将人性在自由贸易中暴露出的弱点描绘得淋漓尽致:“每个人都想从别人身上赢得尽可能多的东西,而让别人从自己身上赢得尽可能少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9页。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0页。

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44页。

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7页。

的东西;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尽可能多地为自己劳动,而使自己尽可能少地为他人劳动。”<sup>①</sup>他还说:“除了谋求一己利益的兴趣之外,还有一种损害别人利益的兴趣。有时,人们甚至不想满足前一种兴趣而乐于能满足后一种兴趣,并单纯进行破坏。”<sup>②</sup>费希特对人性的悲观立场也延续到了政治实践领域,费希特在《法权学说》(1812年)中感叹道:“整个来说,人们都太坏了。”<sup>③</sup>正因为如此,他甚至放弃了自己在《自然法权基础》中精心设计的、取代三权分立原则的民选监察院制度,转而寄希望于一种好人政府来拯救人类<sup>④</sup>。可以说,费希特所设计的锁闭商业国的一个根本目的就在于给贪婪卑劣的人性施加外部的限制,使这样的人性无法展现出来。他认为,取缔自由贸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和国家的利欲膨胀和欺压不公,简单的生活方式和至少不甚明显的不公与欺压总要好过严重贫困和极其明显的不公。

费希特的悲观主义人性观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如果说在希腊古典时期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主题基本是围绕德性和善展开的,那么到了罗马时期,尤其是罗马帝国晚期,思想家们则纷纷开始探究罗马由盛及衰的内在原因,而在这些原因中,德性仍是要害,美德的丧失和道德的堕落总是被列为致命的症结。例如,塔西佗在《编年史》(116—117年)中寻找共和蜕变为暴政的轨迹,指出奥古斯都死后的罗马帝国的皇帝日益昏庸残暴,臣民的道德日益败坏。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道德风尚的衰落乃是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塔西佗的结论一直被延续到了近代,并在范围上从罗马史被推及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另外,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的罗马史》(1519年)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史》(1734年)借古喻今,也得出了与塔西佗的观点类似的结论。霍布斯则认为,竞争、猜疑和荣誉是人类的天性,正是这些天性导致人们彼此争斗,相互为敌<sup>⑤</sup>。卢梭尤其犀利地指出,

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是人类道德堕落的源头,“在写一部文明社会发展史的同时,也能写出一部人类疾病史。”<sup>⑥</sup>这部人类疾病史不仅是身体机理的疾病史,也是德性衰落的疾病史。费希特承袭了先贤的这种悲观主义情结,并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结合费希特的这种悲观主义人性观,我们回顾其此前两年出版的《伦理学体系》(1798年),就特别能感受到他的一种向古希腊德性伦理学致敬与回归的愿望。费希特之所以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崇尚美德,注重品格,就我们在此的论题而言,难道部分地不能归咎于商业牟利巧取钻营,世风日下古德不在吗?费希特伦理学不同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他所呼唤的德性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软弱乏力的“定言命令”和为了义务而义务,而是每个个体履行他所在的阶层赋予他的实实在在的、特定的角色分工和阶层职责<sup>⑦</sup>。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就是个人的美德和国家的正义,也是个人和国家的幸福与善得以实现的基础。可见,《锁闭的商业国》最终力图复兴和实现的无非是柏拉图理想城邦的正义和幸福:“各就各业”<sup>⑧</sup>,“竭尽心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sup>⑨</sup>。

#### 四 解决生存与自由之悖论

费希特也许是近代西方最早在法权—政治领域明确提出国家应以保障人民能够生存下来为首要职责的哲学家之一。他在《自然法权基础》中主张,通过劳动实现和保障人的生存构成“财产契约的精神”,“所有合理的国家宪法的原则是每个人都必须能够靠自己的劳动生存”<sup>⑩</sup>。这一原则也被他运用到了《锁闭的商业国》中。在他看

①《费希特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0页。

②《费希特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0页。

③J.G. Fichte: *Rechtslehre*, hrsg. von Richard Schottky, Hamburg, 1980, S.153.

④参见拙著:《费希特的法权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198页。

⑤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4页。

⑥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高毅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⑦《费希特文集(第3卷)》,第340—342页。参见拙文:“论费希特伦理学的意义”,载《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40—45页。

⑧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8页。

⑨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4页。

⑩《费希特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68页。

来,国家的最根本职能就是确保人民能够靠劳动获得生存的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的舒适度。可以说,国家锁闭起来,禁止对外贸易,并通过计划经济的模式调控各个阶层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等措施,最终都是为了确保人民的生存。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保障的是每个公民“能够靠劳动”生存下来,而不是单纯地给任何人、尤其是懒汉提供生活资料。要做到这一点,费希特指出,国家必须对每个公民都实施严格的监督,看他们是否竭尽所能自食其力以及他们是如何管理和支配自己的财产的。于是,生存问题这时就在根本上涉及到财产和自由问题,并且个人的生存问题与自由精神产生悖谬。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费希特在这两者之间更强调前者。

古典自由主义者强调,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直接体现。例如,洛克指出:劳动是财产权的基础,而既然人“是自己的主人,自身和自身行动或劳动的所有者”,人本身就内在地“具有财产的基本基础”,而且“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sup>①</sup>。康德也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财产即“我的”和“你的”规定为自由意志的表现形式<sup>②</sup>。此外,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约翰·密尔显然都更加倚重市场和社会的自由机制。斯密是自由经济的典型代表,鼓励竞争,提倡自由,“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sup>③</sup>。密尔也鼓吹自由贸易,反对对贸易施加限制,反对政府“限定商品价格并规定制造程序”<sup>④</sup>。但密尔在论及自由时,似乎不太在意竞争弱者和社会底层的个人生存问题。他明确指出:“社会对于那些失望的竞争者,并不承认他们在法律方面或道德方面享有免除这类痛苦的权利;社会也不感到有使命要予以干涉……。”<sup>⑤</sup>可见,他们的学说在捍卫财产和自由的同时,显得无法兼顾所有人的

生存问题。自由竞争带来贫富差距和弱肉强食,弱势一方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呢?正是基于这样的顾虑,费希特提出了他特有的“财产”概念。他认为财产是对感性世界中的自由行动的权利,即“一定的自由活动的专有权”<sup>⑥</sup>,而通常意义上的财产,即对某物的占有,只是从自由行动的范围中衍生出来的特殊定义而已。从财产的这种本质含义考虑,费希特将能够生存视为一切人的绝对的、不可让渡的财产,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动无法保障生存问题,他就失去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如此一来,费希特推论,与这个人相关的一切财产契约也就终止了,从这时起,他也就不用再受法律的约束去承认他人的财产了。为了避免天下大乱,他认为,人们应该从自己的财产中分出一部分给这个人,直到他能够生活下去<sup>⑦</sup>。费希特的这种民生思想在实践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德国经济学家史盘将他所开创的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相对)经济学与费希特建立起了重要关联<sup>⑧</sup>。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则认为,费希特在财产问题上“肯定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民主主义者”,尤其强调一种“民主主义的平等观”<sup>⑨</sup>。

当然,国家要确保既无穷人也无懒汉是以牺牲公民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因为国家对每个公民的监督必须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为此,黑格尔曾多处批评费希特法权学说的警察制度<sup>⑩</sup>。但无论如何,在生存与自由何者优先的问题上,费希特毅然选择前者仍是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费希特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一种霍布斯传统,这种传统首要地表现在公民的生存权相对于自由权的优先地位。霍布斯在谈到国家主权者的职责时指出:“主权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一个会议,其职责都取决于人们赋与主权时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便是为人民求得安全。……但这儿所

①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页、第77页。

②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254页。

③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3页。

④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⑤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⑥《费希特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3页。

⑦参见《费希特文集(第2卷)》,第466-471页。

⑧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7页:“[费希特]在史盘的‘全体主义经济学’的早期发展中,占据有关键性地位。”

⑨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⑩参见G.W.G. Hegel Werke 20. Jenaer Schriften 1801-1807, hrsg. von R.E. Moldenhauer und K.M. Michel, Frankfurt am Main, S.8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35页;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40页。

谓的安全还不单纯是指保全性命,而且也包括每个人通过合法的劳动,在不危害国家的条件下可以获得的生活上的一切其他的满足。”费希特不仅继承了霍布斯的契约论思想和人性观,而且将霍布斯要求主权者保障人民生存权的思想具体运用到了国家的建制之中。在生存与自由的两难中,费希特也像霍布斯一样,主张公民起初应当放弃自由权利以换取国家对每个个体的保护与救济。

如果说康德仍拥有精神贵族的气质,对当时的新兴资本主义文明尚缺乏批判意识,那么,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及其续篇《锁闭的商业国》里则着重表达了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阶层的深切同情与关切。他对劳动者阶层的生存问题和贫困境遇的关注,经由黑格尔主奴意识和市民社会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到了马克思这里就发展成为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既然在自由贸易中,在市民社会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是注

定的,甚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sup>①</sup>,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才有出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序言中强调,德国社会主义者以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sup>②</sup>;同样在19世纪,费希特甚至被誉为德国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sup>③</sup>。费希特与马克思思想的密切关联可见一斑。

### 结语

综上所述,费希特的《锁闭的商业国》是一部具有绚烂的智慧闪光的杰出著作,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虽然他提出的锁闭商业国模式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它开启了德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河,并为马克思思想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 Fichte's Thoughts of a Closed Commercial Country and His Critic on Modernity

ZHANG Dong-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Fichte's *A Closed Commercial Country*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political economics, which i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his thoughts of right in the real country,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mercial country,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the real value of Fichte's political economics is not the illusive utopia itself, but its profound critical significance. Fichte's thoughts of a closed commercial country is summa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critic, namely free trade,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reflections on the paradox between human survival and freedom, which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day for us to critically examin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and think over modernity.

**Key words:** free trade; human nature; human survival; freedom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2页。

③参见沈真、梁志学:《费希特与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